

论保晋公司研究的学术意义、社会价值与研究方略^{*}

王智庆

(太原理工大学阳泉学院, 山西 阳泉 045001)

【摘要】研究保晋公司、挖掘保晋文化,学术意义深远、社会价值巨大,具有品牌效应、指导效应、启发效应、警示效应和回归效应。因此,我们应当科学界定研究目标、全面拓展研究视角、扩充研究力量并转变其组合方式、创新研究方式与方法、建立与完善相配套的研究保障机制,以提升保晋公司专项研究的效能。

【关键词】保晋公司;学术意义;社会价值;研究方略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6285(2012)10-0109-03

保晋公司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开始筹办,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正式创办,总部原先设立于山西省太原市海子边,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总部迁至平定县阳泉火车站附近,直至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伴随日军的大规模入侵而被迫破产。保晋公司是山西近代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是称雄中国商界五百余年的明清封建晋商谋求成功转型的一个典型案例,奠定了山西省基本的工矿业格局,在山西近代工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当前,我们研究保晋公司、挖掘保晋文化,学术意义深远、社会价值巨大,值得引起政界、经济界、历史界、文化界等相关机构和群体,特别是区域文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一、研究保晋公司、挖掘保晋文化,学术意义深远、社会价值巨大

(一) 研究保晋公司的学术意义

当前,我们研究保晋公司与探讨保晋文化,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放眼全国,保晋公司研究的深入开展有利于推进与深化传统封建商人向近代商人过渡的转型研究。保晋公司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将深化中国近代煤、铁矿史研究的力度。

其次,就山西省而言,保晋公司是传统封建晋商日趋衰落、谋求成功转型的真实写照,是轰轰烈烈历时近三年之久、以“争矿权、保利源、废约自办”为宗旨的山西争矿运动胜利的客观产物。没有明清晋商

就没有保晋公司,研究保晋公司其实就是研究明清晋商的归属问题。本项专题研究的深入开展,有利于进一步将晋商学及山西近代工矿业史的研究引向纵深。

最后,保晋公司在自创建到衰亡总部设立于阳泉,长达2/3的企业发展历程中,为阳泉作为一个地级市的创建进行了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储备及文化积淀,促成了1947年阳泉市作为“中共第一城”的成功创建。由此可见,研究保晋公司,对于研究阳泉这座历史短暂的典型资源型工业化城市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挖掘保晋文化的社会价值

保晋文化的深入挖掘,社会价值巨大,具有品牌效应、指导效应、启发效应、警示效应、回归效应五方面效应。

1. 品牌效应。保晋公司作为山西争矿运动的客观产物,是山西民众反帝爱国卫权运动胜利的成果,是称雄中国商界五百余年的封建晋商日趋衰落、谋求成功转型、进行大胆探索的一次伟大尝试,在山西近代区域经济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文化遗产。保晋公司是山西省文化产业打造的一块品牌,同时将成为山西省经济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研究的热点。保晋公司开山西近代工矿业之先河,促成了山西煤、铁矿业由传统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型过渡,奠定了山西省基本的煤业格局,在山西近代工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同时,由于保晋

^{*}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112243)“保晋公司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2-09-01

【作者简介】王智庆(1975-),男,山西平定人,太原理工大学阳泉学院管理系副教授;阳泉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阳泉市城区第八届政协委员。

公司在长达2/3的企业发展历程中,总部设立于阳泉,为“中共第一城”——阳泉市的创建及后来全国最大无烟煤基地的打造奠定了必要的物质与文化基础。可见,保晋公司在山西省特别是阳泉市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特殊文化品牌。研究保晋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历史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经济的双重互动,由无形效应转化为有形效应,由精神效应转化为物质效应。

2. 指导效应。保晋公司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在摒弃时代差异与社会环境变迁影响的前提下,其在公司治理结构、战略管理、生产经营管理、营销管理、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及商业品质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特别值得当代企业家们深思、咀嚼与借鉴。

3. 启发效应。保晋公司由清末的山西商人创办,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实现了由传统封建商人向近代商人的成功过渡,从原先纯粹的贱买贵卖传统商业运作行为,向产生整个社会财富增殖的近代工矿业投资,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保晋公司有许多值得当代人借鉴的精神与品质,例如:爱国性,保晋公司本身就是山西争矿运动的产物,同时保晋公司不收洋股,而且不准将股权转让给洋人,一经发现,不予承认;创新性,保晋公司大力引进高新技术、引进专业人才,并且实现了无限责任制向有限责任制的成功转换;不屈性,保晋公司在逆境中求奋进,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双重压榨下求生存。尽管时过境迁,但保晋文化所特有的启迪效应依然作用巨大,意义深远。

4. 警示效应。保晋公司是山西争矿运动的产物,山西的煤矿开采权之所以易主,缘于政界官员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疏忽大意及缺乏必要的法律卫权意识。山西争矿运动的胜利实际上是保守性胜利,使山西人民承担了275万两白银的额外负担。这一史实给当代政界大规模招商引资以极大的警示作用。

5. 回归效应。我们研究保晋公司、探讨保晋文化,绝不能一味停留于历史与文化层面,其理论研究成果必须进行现实回归,为山西省的文化强省战略和阳泉市的文化强市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戏曲、小说等)注入灵魂、注入活力,使该项专题研究成果回归社会、回归现实、回归大众,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向现实经济效应的成功转化。

二、研究保晋公司、挖掘保晋文化的具体研究方略

目前,尽管保晋公司研究已经逐渐引起社会各界不同程度的关注,并不乏众多的文史同仁参与其中。但客观上讲,公开面世的学术性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如阳泉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于2006年4月编写的《保晋公司史料及研究》(阳泉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曹慧明主编的《保晋档案》(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王智庆、李存华合著的《晋东商业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山西近代矿史研究会、保晋公司纪念馆共同编著的《保矿保晋风云录》(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8月版);由魏德卿主编的《山西保矿运动历史研究》(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11月版),再有就是为数不多的数篇论文了。同时,纵览现有涉足保晋公司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成果依然滞留于表象层面,注重时间、地点、人物及企业发展脉络的研究。当然,笔者也认同,保晋公司研究要想取得重大成果,基本史实的研究必不可少,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就事论事,该项专题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站在战略高度,进行宏观审视与总体把握,最终实现历史文化研究与现实经济的双重互动。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五方面着手改进,最终真正提升本项专题研究的效能。

(一) 客观准确地界定研究目标

研究保晋公司、挖掘保晋文化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社科工程。社会科学类研究课题,主要包括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大类型,本项课题属于理论研究的范畴,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笔者始终认为,尽管是理论研究课题,但决不能定位于单纯的学术性研究,其研究成果必须进行现实回归。我们不能一味地停留于“是什么”、“为什么”层面,其研究目标应当最终定位于指导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当代企业管理和运作。如前所述,本项最终研究成果应当真正体现品牌效应、指导效应、启发效应、警示效应、回归效应等社会价值。当然,我们也应当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目标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哪位学者单打独斗便能完成,更不可能单凭几篇文章或几部著作就能将保晋文化具有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的人文价值全面而系统地展现于世人面前;但是,我们的研究定位必须立足高远,同时进行现实回归。只有这样,研究工作才可能更深入、更持久,研究成

果才可能真正经得起客观史实的检验、广大民众的检验、现实社会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

(二) 全方位、立体化地拓展研究视角

客观上讲,目前学界同仁对于保晋公司的研究,一般都是就保晋公司而论保晋文化,研究视角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深化保晋公司的研究力度,必须进行研究视角的拓展。一方面,我们应当把保晋公司置于整个历史长河中研究保晋文化,纵向拓展研究视角,既考究保晋公司创设前的封建晋商、清朝中后期的整个历史发展脉络及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又考究保晋公司销声匿迹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视角应当进行横向拓展。就地域而言,我们必须跳出阳泉、跳出山西,面向全国、横贯国际进行全方位研究;就人物而言,我们不能只锁定在保晋公司内部,必须统筹考究政界、商界、学界及海外的众多相关联人物;就行业而言,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煤、铁两业,必须考究上游及下游的相关产业特别是运输业;就研究内容而言,我们不能再一味地停留于保晋人物、发展历程、社会影响及作用等方面,更应当着眼于组织机构、管理体制、生产经营管理(包括采购管理、生产管理和销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战略管理、技术管理、商业品质等子课题,展开系统化的研究。总之,为了全面系统地探究与挖掘保晋文化,我们应当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视角拓展。

(三) 研究主体的拓展及其组合方式的转变

当前,保晋公司的研究者、保晋文化的挖掘者主要集中在三类群体:专业学者(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地方文史爱好者、保晋公司后人。其实,笔者认为,为了搜寻更多的保晋史料,为了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为了使相关研究成果可以顺利面世,为了使既有成果能够真正在社会上流通、运用、反馈并适时修补与完善,保晋公司的研究主体应当大众化。诚然,我们要让所有的人来关注并研究保晋公司并不现实,也不可能,但是我们在山西省特别是阳泉市形成一种较为浓厚的保晋文化研究氛围,通过各种有效载体,宣传、鼓励并吸纳各行各业的保晋文化爱好者参与其中,真正走本域大众化研究的道路。再者,对于保晋公司的研究,尽管参与人数众多,但几乎都是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因此,笔者设想并建议,由众多的研究者携手组建“保晋文化研究会”,把分散的学术力量集中起来,合理分工、重点突出并统筹协调,实现由个体研究向群体研

究的转变,适时进行融通与交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才能,把保晋公司的研究进一步引向纵深。

(四) 拓展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方式

实事求是地讲,目前学界同仁对于保晋公司的研究,主要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着眼于基本史实的界定,没有更多地从制度层面、技术层面进行探究。因此,研究成果与现实经济的互动效应较弱,社会影响也较小。客观上讲,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缘于研究方法的单一性与局限性。笔者认为,我们在开展保晋公司专题研究过程中,应力求打破学科界限,开展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既运用文献研究法、野外考察法等历史学研究方法,又运用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等经济学研究方法,还运用实地研究、调查研究等社会学研究方法,同时还应利用管理学研究方法对保晋公司的管理体制与运作机理进行相应的绩效分析,特别是在定量分析研究中,我们还可以运用计算机技术等现代化手段进行数据统计与处理,提升研究的效率与准确性。

(五) 争取政府与社会的支持,建立与完善研究保障机制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科学研究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范畴,各项社会科学研究能否顺利开展并取得高水准的研究成果,除受研究人员思想动态、职业情操和专业技能的影响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以物力与财力为依托的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不管是保晋文化专项研究的开展,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研发,没有资金作保障是寸步难行的。如前所述,之所以许多研究成果停留于表象层面,尽管不乏研究目标定位、研究视角、研究主体、研究方式与方法的原因,但更大程度上归因于研究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研究资金的长期匮乏是制约保晋公司专项研究难以向纵深发展的瓶颈,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保晋公司研究的进度、深度与广度及成果面世将受到很大制约。笔者认为,为了繁荣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为文化强省和强市战略注入灵魂与活力,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应当关注、支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进行专题立项研究,建立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机制,由纯粹的专业研究者、民间爱好者分散研究向各级政府机关及大中型企业开展专题立项研究转变。诚然,任何一项专项研究,要想获取政府及社会的支持,必须事先取得一些基础性、前瞻性以及富有一定社会价值并极具说服力的前期研究成果。目前,关于保晋公司的研究、保晋文化的挖掘,山西省及阳泉

个性与人性并存的另类抗战叙事 ——解读《姥爷的抗战》

张婧磊

(聊城大学 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 鲍光满的长篇小说《姥爷的抗战》, 承继了传统英雄主义小说的主题, 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我”姥爷如何从一个不问世事的文弱书生长成为天津抗日英雄“老枪”的传奇故事, 形成了时空交织调查模式下个人言说的独特叙事模式。小说文本设定了“我”姥爷知识分子、慈父、多情者等多重角色, 在彰显人物个性的同时, 也对丰富的人性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 是作家在新时期对历史、战争与人性的思考与重构。

[关键词] 个性; 人性; 抗战叙事 《姥爷的抗战》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285(2012)10-0112-04

鲍光满的长篇小说《姥爷的抗战》(原载《莽原》2011年第2期), 是一部好看又耐人寻味的小说。它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 “我”姥爷如何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高级工程师, 转变为闻名遐迩的天津抗日英雄“老枪”的传奇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要为姥爷洗清冤屈开篇, 借贾老板之口追叙并完整勾画了姥爷的抗战生活, 在时空交错的叙述交织中形成了调查模式下个人言说的独特模式, 塑造了一个抗战背景下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完美诠释了多重角色设定下的丰富人性内涵。

一、调查模式下的个人言说

叙事模式是长篇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手段, 因为“叙事会引导读者看到一种与阐释特定事

件相关的具体配置, 让读者把某些显现了的事件包括在某个配置之内, 把另一些排除在外, 其主要依据是断点所揭示的情节与故事之间的关系”^[1]。显然, 《姥爷的抗战》在叙事方面具有独特的模式。

小说开篇即告诉读者叙述人“我”的身份, 就是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外孙女。故事中的主人公“我”的姥爷, 因蒙受着“汉奸”的不白之冤, 活着时就开始上访, 最后死不瞑目; 又由于母亲常年奔波上访导致瘫痪在床而将姥爷平反的接力棒交到了“我”的手里, 于是“我”成了一个被迫的侦探, 也形成了调查模式叙事下的个人言说。

调查模式叙事下的个人言说, 首先体现在叙述人“我”与主人公“我”姥爷交替出现在小说文本中。一方面, 作为叙述人的“我”的言说, 既是对贾老板

市有关部门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完善相应的保障机制, 以期将该项研究进一步推向纵深。

[参考文献]

- [1] 阳泉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保晋公司史料及研究[M]. 阳泉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2006.
[2] 曹慧明. 保晋档案[M]. 太原: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2008.

- [3] 王智庆, 李存华. 晋东商业文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4] 山西近代矿史研究会、保晋公司纪念馆. 保矿保晋风云录[M].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9.
[5] 魏德卿. 山西保矿运动历史研究[M].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

The Study of Baojin (Protecting Shanxi) Companies: its Academic Significance Social Value and Research Plan

Wang Zhiqing

(Yangquan College of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Yangquan 045001, China)

[收稿日期] 2012-08-22

[作者简介] 张婧磊(1976-), 女, 河南汝南人, 聊城大学讲师, 硕士。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